

赤心报国 与时俱进

——中国近代著名留学先驱容闳先生述论

杨清平

“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①中国第一位留美毕业生,第一位倡议并组织派遣留学生的著名学者——容闳先生,就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容闳为使“西学东渐”、“富强祖国”,振兴中华,一生先后经历了寻找真理——实业和教育救国——资产阶级改良——资产阶级革命的曲折道路,却始终都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前进,奋斗不息。

1 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②,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容闳自幼家境贫寒,早年丧父后就随哥哥、姐姐在田间干活。后来,经过邻居的引荐,容闳进入澳门的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读书。1847年,学校的布朗牧师企图把容闳培养成一个为美国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干部”,资助容闳赴美留学。容闳先在孟松预中修业三年,后于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这时,布朗牧师虽然同意继续资助容闳求学,但对容闳加上了毕业后充当传教士的条件。对此,容闳慨然说道:“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变宗旨也……予虽贫,自幼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③。拒绝了“慈善”资助后,容闳的经济来源也断绝了,这使他的生活极为窘迫。但是,容闳宁愿过着勤工俭学的贫困生活,也决不在任何引诱和压力面前屈服。

在容闳求学期间,正值中国外祸频仍之际。这个长在澳门的苦孩子,倍感民族劫难之痛,“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所以,尽管传道会的教育在容闳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但他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而是更加强了”。容闳发愤苦读,“常思借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守此宗旨,八年如一日”,“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拼命吮吸着新鲜知识和自由空气。容闳当时攻读的主要是历算、机械等,但由于他特别关心中国和世界政治形势,在写作和哲学方面也颇为擅长,经常研读“十三洲独立史,南北战争史,颇有归国建造中华之想”,并多次撰文探讨救国之道,酝酿着“西学东渐”的留学计划。

容闳报效祖国的大志,虽然早在异国求学时就已奠定,但能否在关键时刻站稳脚跟呢?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了。是回到贫病交加的祖国,还是在

富贵利禄的引诱下乐不思蜀?这是检验一个海外学子是否爱国的起码的一关。当时美国的“机会之门”都纷纷向这位中国留学生敞开着;而在中国,“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然而,这并没有动摇容闳“为祖国谋福利”的赤子之心。容闳在拿到大学文凭后,毅然踏波归国。他慨然说到:“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2

回国后的最初几年,容闳并没有立即找到施展抱负的机会,而是四处奔波,“谋食亦谋道”。五年内,他当过书记,作过译员,学过律师,也经商采购过丝茶。但是,不管是月薪十五金的微资,还是月俸二百两的肥缺,都没有泯灭容闳“维新中国”的夙愿。为此,他甚至谢却了简直是“富埒王侯”的买办职务而甘冒艰辛。

1860年11月,容闳冒着生命危险穿过阵地,前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访察。他向天王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富国策”:“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材,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容闳的这七条献策,涉及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明显地反映了他试图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制度来改造中国的愿望,是他“维新中国”的第一幕。但限于时局的紧张等原因,太平天国没有立即实行这一方案。

洋务运动兴起后,容闳又奔走于洋务派的幕府之间,继续探求着救国的道路和机会。几次向曾国藩提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计划和主张。有人就因此说容闳是洋务派的走卒^①。其实,容闳的思想与洋务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他的行动也是受时代的局限的。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会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兴起,容闳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有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但还没有坚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也不可能在一方面都遥遥超越他的时代。所以,他既没有把对太平天国的同情心变成投身于人民革命的行动,也没有提出马上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他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依附于在当时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先进的政治力量来活动。因此,在洋务派“富国强兵”招牌的诱惑下,容闳于1863年接受了曾国藩的极力延揽,带着富强祖国的热望进入了洋务派的幕府。

作为引玉之砖,容闳首先向洋务派提出了设立机器厂的建议,并积极购办机器,构成了江南制造局的骨架设备。容闳的宗旨有三点:其一,强调要建立坚固的基础工业(即:重工业)这一方向。他说:“则谓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须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其二,本着发展实惠独立的民族工业的原则,并保护和利用中国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他说:“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口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自欧美者价廉多矣”。容闳还劝曾国藩“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其三,容闳的建议是作为“维新中国”的先导之策,他试图仿照西方来建立中国近代化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以达振兴中华的目的。显然,这些与洋务派的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容闳的伟大抱负,就是实施其教育和实业求国计划。1867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

昌把此计划上奏总理衙门。第二年,他又提出选送留学生的具体方案,但后因文祥“母丧丁忧”而中辍。直到1870年,才又由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等联衔重奏。这项计划原陈共有四条:第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以改善昔日漕运之弊(后来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即师此法);第二,政府宜选送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第三,开采矿产,修筑铁路;第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诉讼,以防外力之侵入而越俎代谋。这一方案的一、三、四诸条款,实际是和他对太平天国献的“富国策”互为补充的一体,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救国方案,特别清楚地反映了容闳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华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思想。

当然。派遣留学生才是容闳献策的中心。容闳认为,由于中国教育落后,“国人夜郎自大、顽固性成”,以致造成了今日中国社会愚昧、国力衰弱、“受人侮辱”之结果。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中国由于缺少受过现代教育力能胜任的代表而深蒙不利。在许多至关重要原应由本国人从事的职位上,中国却被迫任用外国人,假手于客卿,中国的权益易于被忽视或出卖。中国的要塞、军舰和海关等大权,大都被外人所窃据。因此,他认为富强祖国的关键是改革教育,向西方学习。倘“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容闳的教育救国理想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对于整整落后了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它还是进步的,也确实有着启蒙变通的重大作用。容闳出于富强祖国的愿望,以“西学”为立国之根本,这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迫使一切濒于灭亡的东方民族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⑥。1871年,容闳呼号了多年的派遣留学生计划,经过再三的延宕留难之后,最终被清政府批准了。同时,容闳被任命为留学副监督,具体筹划留学事宜。1872年,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0名)赴美。到1875年,清政府一共向美国派遣了四批(120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机械制造、造船、铁路等专业。有些人后来成了中国的科技人材、外交人材和实业家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主持修造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

在派遣留学事务中,容闳为了确保留学事业的顺利进行,呕心沥血,披荆斩棘,在国内外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如:在招收第一批的三十名留学生时,国内只有十几名学生应招。容闳为此四处奔波,跑官府,选学生,找家长立保证。既要不厌其烦地跑上跑下办理各种手续,又要里里外外安排每个学生的食宿活动,还要想方设法打消学生和家长的各種各样的思想顾虑。甚至容闳还到香港去苦口婆心地宣传发动,最后才勉强凑够三十个名额。

为了确保留学生的学业进步和思想成长,容闳给留美学生介绍最好的学校和老师,帮助他们选定攻读的方向,训导他们保持中国人的形象品格和民族气节,教会他们如何适应美国的生活、学习,并指引他们吸取美国的民主、自由等先进思想。为此,容闳甚至不惜冒着丢掉乌纱的危险,与顽固守旧分子陈兰彬、吴子登之流进行了长期尖锐的斗争。容闳在《西学东渐记·自序》中写道:“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然而,容闳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1881年,清政府以“思想西化,行为不规”将留美的四批学生全部撤回,容闳也受到了牵连。^⑦但是,容闳倡导的留学事业毕竟进行了

十年,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先河,曾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近代化的科技人才、政治人才和海军人才。同时,容闳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实践也冲破了封建专制思想的牢笼,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解放和透进西方的先进空气做出了贡献。

3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危急日益严重,国难当头,容闳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计划迭遭破坏,理想破坏灭;甚至这个幼年丧父的不幸者这时又遭到了丧妻的打击(为了事业的成功和国家的富强,容闳直到47岁时才结婚安家。而妻死后又留下了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家祸不断。这些几乎使容闳到了绝望的境地。但他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与命运抗争,与险恶的政治形势抗争。

从1895年到1896年,容闳曾经三次恳切地实给清政府献策^⑧,但每次都遭到冷遇。这使容闳的思想开始发生剧烈地变化:第一,容闳的新政策被张之洞冷遇后,使容闳终于认识到,张之洞等“对于中国全局,既无一定之宗旨,亦无方针可言,而于予所献之计划,则又嫌太新太激烈”,洋务派“与予不合”。第二,盛宣怀“染指”破坏了国家银行计划后,容愤然揭露了这些洋务头子们“家资累万”、“贿赂”营私的丑闻。并慨叹“尊自太后,贱及吏胥,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已经达到了极点。第三,对于途径山东的津镇铁路计划,清政府服于德国的压力,不敢坚持和捍卫中国的权益。“外交部中,竟无一人能引证条文,驳斥德国的无理要求,深恐惹起国际交涉,一惟外人之命是听”。并大骂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最可耻辱”之条约。这样,容闳从长期的切身体验中,深感洋务派的反动和清朝封建政治的腐败,清醒地认识到:光凭教育和开发实业,仅仅依靠清政府和洋务派的活动,已经不可能救国,“而于中国根本上的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这表明,容闳要以新的政治行动来实现其救国的美好理想。

变法维新运动兴起后,容闳断然摆脱了洋务派的羁绊,与清朝政界“断绝关系”,并于1890年在北京结识了康、梁^⑨。从此以后,容闳就从多方面赞助变法,还与康有为有着很深的交谊。戊戌政变前,容闳的寓所几乎成了维新党领袖的会议场。政变发生时,容闳曾冒着危险多方设法营救变法领袖。“谭复生(指谭嗣同)入袁世凯寓所,说袁勤王,……卓如(指梁启超)至金顶庙容纯斋处,候消息……闻袁知变不奉命云。容纯甫欲请美钦使,然以其无兵,无济于事,却之”^⑩。政变发生后,容闳曾致函李提摩太营救梁启超^⑪。容闳也因“隐匿党人”之嫌而托迹于上海租界。在万分危险之时,容闳仍然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强学会”,并任第一任会长。1900年,容闳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上海“张园国会”,并被推为会长。他在为自立军起义起草的英文对外宣言中明确表示:“决不承认满州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政权必将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树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利与之人民”^⑫

4

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对满清统治极其痛恨,对顽固的保皇党人康梁等,多次痛斥和谴责,并主动向资产阶级革命派靠拢^⑬。这些都说明了容闳已经开始从一个改良派的追随者,进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赞助者。

容闳能够开始这一可贵的转变,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渊源的。首先,在戊戌变法后,孙中山等人所倡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蓬勃兴起,而康梁等改良派却仍然死守保皇宗者,反对人民革命,并指望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来完成变法;其次,保皇党人这时的思想行为,与容闳一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的封建统治,

对于人民革命深表同情的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日益对立。

从容闳的身世和个人际遇来看,他是一个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他抨击社会腐败,力主铲除欺压专制的政府。他参与洋务幕府,多次向清政府上书,提出一系列改革计划,其宗旨都是要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移植于中国,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无益于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封建统治。为此,他坚决反对列强对华的侵略和蹂躏,保护民族的尊严和权益,并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列强的侵略本质和中国苦难的原因。容闳曾痛切地指出,“迨后外洋机器输入,复经国际战争及通商立约等事,而中国劳动界情势,乃为之一变”,“中国工界乃大受其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此不仅扰乱中国工业制度,且于将来全国之经济、实业、政治上皆有莫大影响也”。晚年,容闳对中国所遭受的外来侵略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说,只有“中国能勃兴,方可遏止日本独握东亚霸权,欧美又岂能漠视”^⑭。

容闳还深刻剖析了中国历史的演变,高度赞扬了人民革命的伟大意义。他在自传中曾经这样写到: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两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只有太平天国运动才是千古未有的真正的“革命”。“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不能免于革命”。甚至“予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因此,当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视为“匪”“贼”暴乱的时候,容闳能冒杀身之祸亲赴天京献策,甚至还“愿为马前走卒”;当地主资产阶级群起攻击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容闳却高度评价了义和团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功绩。他说:“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⑮。这些真知灼见,正是容闳爱国思想的闪光之点,是他献身精神的可贵品质和与时俱进的力量源泉。

1899年,容闳遭张之洞通缉而避居香港,开始与兴中会的人物接触,他多次与孙中山晤谈,与谢缵泰、李纪堂过往甚密(二人均为兴中会会员)。对谢欲“在广州举义,亦极表同情”^⑯。1902年,容闳参与了“大明顺天国”的起义活动,并被推为临时政府的总统^⑰。事泄后,容闳避难美国。在临走时,他对前往送行的革命青年刘禹生说:“孙逸仙自伦敦释回,访予谈数日,……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予助以华盛顿、费兰克林之心志。他日见面,汝当助其成功”^⑱。

容闳赴美后不久,谢缵泰在信函中要他“在美国组织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争取美国朋友及同情者的合作、支持”。容闳复函说:“我已准备好在世界此端,尽我最大的努力来满足世界彼端的你的要求。尽快把暗号或密码转送给我”^⑲。1908年,经容闳介绍,孙中山与美国军事家司马李和财界人士布司建立了通讯联系。容闳还函约布司和司马李在洛杉矶附近举行了长堤会议^⑳。1909,容闳与布司和司马李拟出了一项援助孙中山起义的“中国红龙计划”^㉑。1910年3月,孙中山、容闳、布司和司马李四人在洛杉矶多次会谈,最后制定了五项起义计划。内容为:一、暂停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准备未周的起义;二、以孙中山的名义委任布司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向纽约财团贷款,并由孙中山办理一个由国内各省革命派代表签署的文件,作为贷款的证据;三、运送在美训练的军官若干,以充实革命力量;四、贷款总额为350万美元,分作四批;五、筹组临时政府^㉒。后来,孙中山在此基础上召开了槟榔屿会议,并准备和发动了广州起义。

1910年5月,容闳不幸患了中风症。但即使是在病危之中,容闳想念的仍是革命的发展,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②③}。1911年12月,容闳在病榻上连致谢纘泰三函^④。在19日致全体革命者的函中说道:“你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那些三百来深受压制的人们——高呼着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痛苦去赢得自由和独立。既然你们已经把满清统治者踩在脚下,那么,也不要让那些政治两面派把你们诱离你们坚定的初衷”。在22日函中写道:“我目前所焦虑的是现在北京的残暴政权将为袁世凯、唐绍仪一伙的势力所把持。……这无疑会象满清统治复辟一样黑暗。新中国应当掌握在真正的中国人手中,而不能落入那些连结着干涉我们内政的欧洲野兽的两面派和叛徒手中”。可惜这些诚挚而清醒的衷告,当时并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所记取。在29日的函中,容闳请谢纘泰在去南京出席孙中山就职典礼时,转达他对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衷心祝贺,并表示他十分渴望能回祖国,亲眼见一见梦寐以求的共和国,结识所有的革命领袖。

1912元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致函容闳,尊容闳为“谋覆满清之专制,而建立伟大之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之幸福”的“老同志”,“当此破坏之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振环宇,加才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⑤。但当时,已经84岁高龄的容闳博士正瘫卧病榻,处于生命的垂危之中。尽管自己不能亲睹共和,但容闳在临终嘱咐中谆谆告诫两个儿子,要他们必须舍弃一切,回祖国服务,继承他的未竟事业”^⑥。1912年4月21日,容闳因脑溢血病发逝世。

容闳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不断前进的一生。他“以天下为己任”,有富强祖国的满腔热血,这使他能将个人的生死荣辱完全置之度外,不辞千辛万苦地拼搏奋斗;也使他能及时校正自己人生的航向,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不断前进。所以,容闳虽然并不算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思想家和革命活动家,但他是一个热忱救国、与时俱进的革命实业家,他同样被历史所铭记,被人民所敬仰。从容闳身上,也昭示了一个人的奋斗和价值,只有在与民族的兴亡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并且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时候,才是永恒的。

容闳的一生,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经历了从实业救国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艰苦探索,这也正是中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发展历程。历次大规模的救国斗争都先后失败了,而容闳的一次次尝试也没有成功。但是,中华民族一浪高一浪的不屈不挠的抗争,使帝国主义终究不能灭亡中国,使封建势力日暮途穷;而容闳等无数爱国之士各种救国方略的求索和挫折则表明:只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明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富强祖国的伟大真理,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是救国救民的真正救星。

注 释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②③何广棣:《族谱所载有关容闳之史料》,《传记文学》第35卷第4期。

④《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书。)

⑤关于容闳的评价问题,有人说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范文澜、张其成等);有人认为他是洋务派的走卒,其主张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利益(如:王永康、胡绳等)。

⑥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西方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

李文安

尽管行政管理活动在历史上早已存在,但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却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系列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西方行政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西方行政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化的大生产为行政学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了产业革命,机械化的复杂劳动代替了简单的手工劳动,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代替了各自独立的小规模的手工工场生产,众多工人的集中劳动代替了少数劳动者的分散作业,这一切使管理问题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且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资本家为了继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使自己的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不败地位,就必须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科学管理,这促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当时其它因素(政治及思想文化等)的作用下,管理学又被介绍并运用到行政领域,导致了行政管理学的产生。

⑦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67页。

⑧指1895年给张之洞献的“新政”策;1896年给张荫桓献的设立国家银行计划;1896年给清政府建议修建津镇铁路计划。

⑨杨复礼:《梁启超年谱》,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72页。

⑩《康南海自编年谱》,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61页。

⑪《康南海墨迹·程潜跋》,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141页。

⑫《唐才常烈士年谱》,《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页。

⑬⑭谢增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第20—25页。

⑮⑯⑰刘禹生:《纪先师容纯父先生》,《世载堂杂记》。

⑱陈春生:《壬寅洪全福广州起义记》,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316页。

⑲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109页。

⑳㉑罗香林:《早期留学美国的容闳与中华民国创建之关系》,《东方杂志》复刊9卷5期。

㉒《孙中山年谱》第103—106页。

㉓㉔袁鸿林:《关于容闳的晚年》,《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

㉕胡汉民:《总理全集》(三)第227页。